

廣東文史資料

第十八輯

(內部發行)

6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廣東文史資料

第十八輯

(內部發行)

77.98/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965年2月

广东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

广州市解放北路22号

广东省粤刊内字第137号登记证

*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965年2月出版 定价0.80元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選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从清末到抗战前的广州报业	沈琼楼、陆遜翁 (1)
淪陷时期广州敌伪报业	郑广忠 (33)
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的广州报业	陆 羽 (48)
《原子能》小报创办始末	李汉冲 (86)
李伯鳴与《中山日报》	李鵠飞、李松庵 (90)
关于《中央日报》的一些回忆	佟紹弼 (104)
清末党人利用粤剧宣传革命点滴	邓警亚 (111)
解放前唱片公司概述	陈卓瑩 (113)
广州培正中学怎样为美帝文化侵略服务	賴奕輝、邓鷹扬 (121)
从教忠学堂到教忠中学	曾紹洙 (141)
广东早期农业教育和农业試驗	梁惟一 (148)
邹魯在中山大学任內	曾紀蔚 (155)
中山大学“抗声社”幕后	江錦兴、张仲絳 (164)
补充訂正	
对《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一文的补充	陆丹林 (177)
关于《广东师范教育制度的变迁》 一文的补充訂正	罗宗堂 (181)
附載	
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一九六四 年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見	(182)

从清末到抗战前的广州报业

沈琼楼 陆遯翁

沈琼楼写《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一文（以下简称沈文），系记述1903年至1920年间的广州报业情况。辛亥前后，办报的动机，大部分系从政治着眼，故有革命和保皇两派，既不革命、又不保皇的中間派，为数甚少，沈文曾加以闡述。自癸丑二次革命失敗，龙济光入粵，一天而封八家报館以后，办报的趋向便由政治而轉为商业化了。其特点主要以赢利为目的，当然放弃了促进文化、指导輿論的責任，甚至有被譏为只有紀載而沒有言論的“名副其实的新聞紙”的。除投合时尚，以低級趣味来吸引讀者外，对同业的竞争，更施用种种卑劣手段，市儈的气息甚浓，非亲历其間者，不能想象。沈琼楼自辞去“羊城日报”編輯职务后，虽繼續在人权、新国华、越华、公評、現象等报担任小說撰述，但見聞不多，又因年老善忘，許多印象都已模糊，与老同行邓警亚联系之后，有所启发，乃与陆遯翁共同合作，再成此篇。主要是談商业化的一些报纸。有政治色彩的报纸，也略談一下。点点滴滴，挂漏难免，仍希閱者指正。

一、辛亥前后几間报纸的补述

1. 时敏报：时敏报的性质与羊城日报略同，但出版在羊城日报之前，是接着时敏学堂和时敏书局而成立的。主要大

股东是西关富紳邓家仁（君寿）、邓家让（恭叔）兄弟，都是三水县举人。他們都为着所謂开通民智，热心提倡新兴文化事业，但因經營不善而破产。学堂首先停办，书局接着出頂与人，最后报館也停版。

时敏报初办时，延孔昭炎和番禺許之衡（字少白，中过付榜）当編輯。編輯部和印刷所都設在城内朝天街一間大屋，发行部則在十八甫。后来邓家兄弟因营业亏损，无法支持，就全盤頂与陈新吾接办。报館易主后，編輯、印刷和发行都合并十八甫一个地方，报纸內容也經過一番革新，同盟会党人謝英伯也是当时該报撰述人之一。該报营业仍不发达，在辛亥革命前即停刊，陈新吾轉去日本学法政。民国五年，袁世凱称帝时，国會議員譚文駿偕集思广益社中人南来，謀在广州办报，鼓吹帝制，拟頂“时敏报”的招牌和鋪底，时陈新吾已学成归国，正与周宝鑾、邹永誉等筹办私立广州法政專門学校，无意办报，便照頂与譚。譚字璧初，新会人，頂受报館后，仍以时敏报名义出版，聘該报前記者同乡人卢祖燊（字百朋，笔名博浪，又称博郎）为編輯，譚則自任社长，公开鼓吹帝制，譚、卢并曾联电袁世凱劝进。帝制失敗后，时敏报即停刊。招牌搞臭，再无人承頂来复业了。

2. 安雅报：安雅报的大略，已見沈文。它是附属于安雅书局的，初出版时，由于惧怕清吏对报館的淫威，不敢称报，只称为安雅书局世說編，办报館而不敢称报，只有此一家。入民国后，才改称安雅报。該报古香古色，初时撰述員仅有范公讜、詹宪慈、朱鹤和黎佩詩四人，后来添上撰說部的龙干甫。范是优貢生，字季馨，笔名寄馨，又名據臆。詹是番禺举人，字菊人，笔名旭旰。朱字云表，笔名亦云。

詹、范二人在清末都由政府选送日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归国后，同为教育界紅員，但晚間仍到報館辦事。辛亥革命后，詹、范均离去，只留朱、黎共同維持，因力量单薄，报务奄奄一息。詹去北京，走梁士詒的門路，另有前途。朱也去北京，但他去是避难，而不是找寻生活。范的元配是朱执信的长姊，范因好冶游而染得痲疾，夫妻反目，其妻服毒自杀。时朱执信还留学日本，得訊大憤，声言归国后，必以手枪餉范。及辛亥反正后，朱督办广阳軍务，范便不能不离粵以避。安雅报直到莫（荣新）、杨（永泰）离粵，标封全城報館时才停版，粵軍返粵后，也沒有复业。

3.七十二行商报：七十二行商报总司理兼发行人罗少翹，总編輯陈蘿生（即現在广州市文史館长陈大年），副編輯陈宝尊，撰写社論的担綱者是馮智慧（笔名春风）、钟履崖（笔名独佛）。他們办报以稳健称，并标榜为大报型式，副刊不刊载諧文、班本、粵謳等，即小說也仅以书页式登載过一篇“齐家鏡”，其他只登些詩詞和詩钟等。陈罗生在民元时任都督府秘书，仍任总編輯事务，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后，才东渡日本留学，由陈宝尊任总編輯，苏泽民任副編輯，一直至頂盘与人，都沒有更換。罗少翹自投欧战之机，专載德軍战訊，銷路增至七八千份后，以为只要消息灵通，就可穩操胜券，便想再来一次。这回却在國內方面着手，愿以重酬购政治新聞的专稿。有杨姓的訪員，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姓名和来历，他的訪稿詭名很多，有时称梦寐氏，有时称余公民，聞罗要购政治新聞专稿，便毛遂自荐，向罗称：他有一表兄任龙济光的机要秘书，“中央”及各地当权人物的来往要电，均归其保管，每月可择要抄送，件数多少，不能預定，但每月稿酬要一百元。罗为着投机，竟一口答应。一

連两三个月，杨送了不少稿来，大部分是模拟黎元洪的秘书饒汉祥替黎泛論国事的通电，前后共发表过十多通。那时正是民四（1915）的上半年，袁世凱大权独攬、阴谋称帝之际，黎元洪蛰伏京师，噤不敢动，七十二行商报却不断有黎电发表，而別家报纸却没有，的确是一种珍聞，不止引起讀者的爭相訂閱，更引起同业的輾轉登載。七十二行商报不会入黎元洪和他的僚属之目，但上海申报和新聞报等也轉載起来，就生出問題了。黎发现此种伪电后，即以副总统府名义电上海护軍使查究来源，得复是轉載广东的七十二行商报的，便逕电广东当局查究。姓杨的訪員聞风，即潜逃无踪。罗少翽迫得請社团紳商之大力者向龙济光說情，沒有即时封报拿人，把案移到法院审理。伪造官方文书毕竟是触犯法律，由检察厅提出公訴，把发行人罗少翽和編輯人陈宝尊传去审讯。在庭訊之日，七十二行商报，特雇备轎子数十乘，遍請各报同业前往旁听，并延律师李兼善为辯护人。由于証据确凿，无可抵賴，經過审判，卒之罰了一笔款子了結。而罗、陈二人則在仓边街看守所坐牢数月。七十二行商报刊行十余年，因商务广告多集中于該报，銷路不弱，获得赢利不少。自經这次訟累，日走下坡路，营业越来越縮，只靠代理上海施德之济众水佣金收入来弥补。后来代理合約期滿，施德之拟撤銷它的代理权。罗少翽不欲丧失这项权利，乃亲往上海向施德之接洽，但到上海后即患病逝世，代理权也不能繼續。

55

4.总商会报：总商会报創行于光緒末年，稍后于七十二行商报，館址在十七甫，鋪位甚浅，鋪面是营业部，楼上是編輯部，柜面背后就是印刷工场。原是总商会的机关报，初开办时，由金葵当編輯人，金字灌青，一号澄波，丁酉科順

天举人，盐业巨头，是当时商会领导人之一，每晚乘三人长班轿子到报馆办事。据说当时该报每日出纸三四百份，除有关商会人物免费送阅者外，门市售出的纸，每日不到一百份。在这样情形下，资本很快就亏蚀过半，金葵即辞职不干。續請江孔殷来当編輯，江的排场和开销，一如金葵，而业务絕无起色，不久将老本蝕光，江也不再干，約在宣統初年时停版。民元时，商会董事、布业行商刘仲平独资創辦商权报于打銅街，并向当时总商会长陈勉畚租借总商会报的旧鋪位、招牌、印机、鉛字，重新复业，加一“新”字于招牌上，称总商会新报。两报的編輯事务，由叶茗孙总其成。参加撰述的，除沈琼楼外，还有张鏡藜、譚少沅、黃天山(笔名阿修罗)等人。未几，刘仲平死去，所营順利、粵利两布庄相继倒閉。商权和总商会新报两报缺乏支持力量，沈、叶、张、譚、黃等都相继离去，商权报打銅街的鋪位便出頂与人，迁至十七甫总商会新报，用套版（即同一内容，但改換版头招牌）方式合并营业，两报出紙都不多，艰苦支持两年才歇业。

5. 共和报：共和报为广州最著名的黄色报刊。該报的說部和新聞記載都很猥褻，但未受到警察当局的取締，原因該报編輯宋季緝有兄玉堂，是老警界人員，迭任警察区长，在警界里有一种潜势力，宋季緝有恃无恐，故以低級趣味的說部和記載来吸引讀者，銷流甚暢，每天出紙达七八千份，为同业所羨妬，但不齿于大雅，得到“厨房阶砖”（咸湿之意）的称号。至1920年起，銷路日跌，宋季緝才惕然醒悟，思改变其經營。共和报自出版以来，一向不注重社論和时評，只注重諧文、小說、班本、龙舟、粵謳之类。至是，思改絃易轍，乃延东莞人陈秋霖、陈孚木兄弟主編新聞和撰写社論、时評。陈炯明背叛孙中山，陈家兄弟原是依附陈炯明的，曾

在香港办报，痛詆孙中山，后来經廖仲愷将陈家兄弟說服，乃調轉笔鋒，大数陈炯明的逆状，因而跃登政治舞台。最后秋霖与廖仲愷同时遇刺身死，孚木却做到交通部次长，宋季輯每因此引以为荣。但陈家兄弟主編共和报时，业务亦殊无起色，并且每况愈下，至1936年便歇业。宋季輯至1962年八十八岁才死去。

二、远东公司名下的报业

論商业化的报纸，应先談远东公司所属各报。远东公司实为李銘志个人的組織，銘志字伯远，老报人李大醒的长子，远东云者，系李伯远全东的涵义。远东公司首先出版的是新报，时在1914年。新报的編輯兼发行人原是伯远，但出名是李抗希，因此他的名字在报界內是以抗希行，伯远反少人知道。继新报后出版的十余年間，連續出过快报、真共和报和新国华报并且有一个时期是四报并行的。

远东公司有一个极大的污点为同业不齿的，就是挂外国旗。李抗希以中国人在广州办报，本无需托庇于外人，而远东公司却在澳門葡国政府注册，以葡商名义在广州来营文化事业，这是令人感到可耻的。所以这样作的原因，据李抗希亲自向沈琼楼解释說：远东公司成立于龙济光一日标封八家报館之后，那时各报都不敢讲一句公道話，新报就在这个时候出版，出版后的言論，少不免由他的父亲李大醒主稿。李大醒素以敢言称，（大醒原是新会举人，榜名鵬章），一向在各报写社論、时評，放言高論慣了，恐怕触忤当道，有受标封的危险，因此借一面葡国旗来作护符，使当局有所顾忌云。沈琼楼曾参加过快报和新国华报的編撰工作，頗知他的底蘊，茲分別叙述如下：

1.新报：新报是頂受广南日报的鋪位来开张的，門首最刺人眼目的是挂上一面葡国旗。新报的編排和内容也和其它各报差不多，无甚特色。号召力量仍然是李大醒的文章。大醒以前同时任几間报館的撰述，精力分散，意志不能集中，这时各报都已噤若寒蝉，大醒无用武之地，就将全付精神用在新报的社論和时評上。議論虽然平和一点，笔鋒仍属犀利。大醒虽未以原名来发表他的文章，改笔名为“閑云”、或“野鶴”，但因它尚有点朝气，讀者爭相訂閱，銷数近万份，为全城报館之冠。

2.快报：快报的出版，是李抗希生意眼的第一手。它的組織动机有三点：第一，眼見国华报提前出版，于隔晚出售明天报纸，銷路甚暢，可以仿效；第二，广州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晚报，以晚报的姿态出現，是不愁銷路的。晚报的銷场，以花天酒地为較多，花天酒地原流行一张花报，名天趣报，专載陈塘、东堤各地花事，而不注重新聞，如果新聞花事并重，是能适合多种胃口的；第三，新报又有現成的人手和工具，稍为布置一下，便可多出一张报纸，多获一点利潤。快报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于民国六年（1917）間出版了。这間报的内容是相当貧乏的，虽說注重新聞，但由于每日下午四时左右就要“埋版”，六时以前就在街上叫卖，有时間性的本地新聞訪稿是絕對赶不上的，只有靠着剪刀向港、沪报纸猎取材料。为着与天趣报爭銷路，划出四分之一版来登載陈塘、东堤的花事，弄成半花报性质。只在副刊方面稍为下点工夫，有几篇連載小說来吸引讀者。該报初出版时，銷路尚暢，也有点贏利，三数年后，銷路日縮，不独无利可图，更要亏本，便自动停刊。这間报属于兼营性质，沒有牵动新报，对远东公司的整个营业所发生的影响也不

大。

3.真共和报：真共和报的创刊，大約在1919—1920年間。这是李抗希生意眼的又一手，不过这一手在竞争中来个冒名影射，更来得下流一点。上文已經表过，共和报是以黄色姿态来吸引讀者的，在1919—1920年間，低級趣味已經維系不住讀者，共和报的銷路正日走下坡路，方思改弦易轍，以維持其固有的营业，实不堪打击的。真共和报的出現，人們就认为有如商场中楊桐竹林的蔞盛行后，有楊松竹林的蔞来冒牌，欧阳戊隆的生发油暢銷后，有欧阳茂隆的生发油来混充一般，純然是一种市儈手段。共和报老板朱季緝对李抗希这一举动，原是十分憤慨的，但无如之何。李抗希乘共和报风雨飄搖之际，出版真共和报，滿以为可搶夺共和报的銷路，但結果适得其反，只搶夺了自己的新报的銷路。原因共和报虽然在当时已改換一下內容，但仍保留着一些本来面目，拥有相当数量的基本讀者。真共和报鉴于共和报以黄色姿态而失敗，就不敢再蹈其复轍，其內容一本正經，这样就动摇不了共和报的基本讀者了。这原因还居次要，主要原因实在报販方面。

广州報紙，在辛亥以前，大都是由报館派人专送的，称为专派。辛亥以后，逐漸出現零售报販，一部分是現买現卖，每晨由报館买到報紙后，即拿到茶樓門口出售；一部分是整买零卖，带点代理性质，向报館买得報紙后，分送訂戶，每月收費一次，尤以后一部分的人为多。报館方面以交由报販派售，可以即日收回紙价，有利于資金的周轉，远胜于专派，便将专派一律取消，報紙推銷之权从此就不在报館本身，而轉移到报販的手上了。报販的經營，必須筹备一笔資金，資金是多多益善，少則二三百元也可以。按当时币

值，報紙售与报販的价格，看銷流情形而定其高下，每份最高售一分六厘，最低售一分一厘（均按小洋一毫作七分二厘算），平均每小洋一毫，可购得報紙六份。零沽每份是銅元四枚，每小洋一毫，可找銅元一十三枚，利潤是相当可观的，但售不出去就要亏折，比不上有基本訂戶的好。訂戶整月收費一次，每月报費小洋七毫，当时的報紙在星期天是停刊的，一个月只二十六天有报，每份報紙的利益虽然仅有式毫多点，似乎比零售少些，但有一定的銷售对象，它的可靠程度就高得多，因此当时报販都以爭取基本訂戶为急务。当广州报业全盛时，报販共有数百人，其力足以操纵報紙的涨落。但报販的利益和报館的利益是有矛盾的，报販只愿推銷售价較低的報紙，售价較高的報紙一定受到报販的抑制，特别是新出版的報紙，如果售价定得稍高，和报販的利益有冲突，就会遭到报販的扼杀。报館知道報紙的推銷要完全依靠报販，对报販的利益必須經常考虑照顾，才能維持营业水平。新出版的報紙，除免費送閱三天外，还要降价平沽一个时期，降价的程度要在一分以下，給报販以較大的利潤，报販才乐于替它推銷。待过了一个时期，報紙已打开一定銷路，才能慢慢提高售价，仍不能过高，否則还要受到报販的抵制。

同行如敌国，自古已然，真共和报的出版，更明摆是原日共和报的敌国，要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宋季緝的对策是：在真共和报出版之日，即将共和报的售价降低三分之一，由一分五厘降至一分。各报販也知道共和报拥有一部分不能动摇的讀者，对动摇分子的选择，最好还是新报的讀者。首先真共和报和新报是同出一源，編排和内容，不相上下，适合新报讀者的胃口，其次又是对新报一种报复。新报

初发行时，每份售价仅一分一厘，报贩极力为之推销，涨势甚速，销路稳定后，距初出版时还不到一年，便把每份售价提高到一分三厘，报贩已经很不满意。后来因欧战关系，洋纸来源断绝，改用江門土纸，借口纸价增涨，再把每份售价提高至一分六厘，小洋二毫，仅买得报纸九份，使报贩的利益大为减少，报贩和新报的矛盾便更大。真共和报出版三天，“散纸”（即免费送阅）期满后，每份售价定为一分，便乘机以真共和报来代替新报。数月之后，真共和报销路虽不弱，但抢得同业的生意并不多，新报却被抢去四分之三，这是李抗希始料所不及的。经过一番分析，了解所以致此的原因，知道敌不过报贩的势力，只得用妥协方式，找报贩中的较有力量者来商量，将新报的售价降低，将真共和报的售价略为提高，一律每份售价一分三厘，这样才把局面稳定下来。是时真共和报的销额比新报多四分之三，李抗希多办一间报纸，几乎一无所得。无可奈何，只得将新报原日全班人马转移到真共和报集中力量来办理。新报以后虽仍继续出版，但已奄奄一息，了无生气，新闻稿件都是靠剪刀得来，不能吸引读者，残余销数也不能保持，最后期的门沽，每天达不到二百份。

4.新国华报：李抗希创刊新国华报已是他办理报业的最后一手了。真共和报出版仅两年，便与原日共和报同其命运，销路日跌，无可挽回，不得不另行打算。那时国华报的招牌还吃香，冒名影射的，已有国华时报和真国华报两家，李抗希企图鱼目混珠，再来一个新国华报。可是他那时对报业已经有点厌倦，不是初时那么雄心勃勃了。李抗希的生意眼初时着重于报业，但早存狡兔三窟之心，就在新报最发达的几年里，经营别业，先在第八甫开张一家酒楼茶室，仍以远

东公司命名，后又開設一家藥房，生意也不惡。由于不是他亲自經營，那家酒楼茶室不久就首先倒閉。到新国华报开办时，李抗希的精力已轉到藥房上，不肯亲自出馬，只聘卢博郎来当編輯。也曾約沈琼楼去主編副刊，沈因校課繁忙，沒有答应，只替他写些小說。李大醒因年老擱笔，沒有再写文章。有此种种原因，新国华报的面目，就不如真共和报的初出版时之有朝气。鉴于真共和报出版时的教訓，在新国华报未出版前，李抗希先与报販头目协定，把每份售价固定在一分三厘上，不再增减，因此它的銷路也能維持在四五千份之間，并且連續两三年之久。对真共和报的处理方式，一如新报。大約在1930年时（具体時間記不清），新国华报也已无声无臭，三家报館的招牌便同时在远东公司除下。抗战期間，沈琼楼由香港搭船往广州湾（今湛江）在舟中曾見李抗希一次，当时他以走貨为业，后来聞他客死在高州云。

三、惠民公司名下的报业

惠民公司經營报业的方式，和远东公司并不相同。远东公司是由老板亲自动手把业务搞起来，而惠民公司則专靠腦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把业务搞起来后，坐享其成，但得魚忘筌，把辛勤劳动的工人抛弃，其剝削工人的程度，远远超过远东公司。

惠民公司并不是一开始就經營报业的。它原先是經營印刷业，拥有印刷机三架和大小鉛字甚多，而且在第七甫有正鋪（即后来越华报的地址）和棧房（即后来国报和国华报的地址）两大間，是王泽民独資創办的。王泽民，东莞人，系王宠惠的从兄弟，原在香港业西医，認識不少保皇党人，因业务不振，挾資来省改營印刷，但业务也不能开展。适华国

报因股东内部糾紛，陈新亚和譚荔垣、陈柱廷等退出而組織国报，就利用王泽民的鋪位和机器来开办，并推王泽民作經理。后来国报停版，保皇党派系中人完全退出，王泽民就和原日副編輯陈柱廷在国报的基础上組成国华报出版。

国华报于民四（1915）年間出版，是以无党无派、专从营业着眼的姿态出現的。陈柱廷主持編輯事务，也求投合时尚，适合各界的胃口，但不流于太过黃色。他知道学界人物喜欢看这张报纸，便选择許多趣味浓厚的清代秘聞、軼事，逐日刊载，来吸引这一部分人；又知道当时戏迷甚多，捧角之风极盛，特辟“顾曲談”一栏，延署名“自了汉”的譚某主持，批判抑扬，虽未完全中肯，但一般有閑階級，茶余飯后，不免人手一张。为着評判男旦俏丽湘和千里駒、女旦角苏州妹和李雪芳的优劣，不惜騰出报纸半版的地位，尽量登載各界来稿，累月不休，借此来推銷报纸。还有一手突出的首創办法，就是提前出版，在今日黄昏就出售明天的报纸。为这件事国华报每天要有两个版，对編輯人員和印刷工人來說，都是双重工作，劳方如果不卖力，决办不到的。提前出版的那一张，副刊是隔日編成印就，专电和中外新聞是向港、沪各报剪取，本市新聞約几个訪員抄取一些例行公文，作为专稿，这样就可以提前埋版付印，于黄昏时交报販沿街叫卖。提前出版的报纸所印无多，只适应报販的零沽而止。晚上收到各地訪員来稿后，再做一番工作，除副刊外，专电和新聞两栏都从末尾向前抽出，以容納重要和新鮮的稿件，有时省市稿件挤拥时，甚至把中外新聞整栏抽去，因此提前出版和正常出版的两张紙的内容有时是大同小异，有时是大异小同的，所以国华报的銷路，不因提前出版和每天有兩種版而少減，相反地更收到宣传效果。“明日国华报”五字，在